

论胡适改称“白话诗”为“新诗”

李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改称,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反映了胡适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现代诗歌命名问题的不同认识,其中涉及两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各自的含义及其间之关系、改称的原因及结果等诸多问题,而探讨胡适的相关观点是解释这一事件的关键。

关键词:胡适;白话诗;新诗;改称;《谈新诗》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6-0095-05

自从在美国留学时开始尝试白话入诗,胡适便高频率地、未曾更改地使用“白话诗”这一名称,在归国之后的前两年继续沿用,即使发表于1919年5月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一文^[1],以及1919年8月1日完成的修改稿《尝试集·自序》^{[2]152},仍然在用“白话诗”;并且在他的影响下,其周围的人都使用“白话诗”这一名称,如朱经农^{[3]289}、任鸿隽^{[4]3,18,20}、钱玄同^{[5]134}等。然而,情况于1919年10月发生了变化,在《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一文中,胡适启用“新诗”这一名称。自“白话诗”至“新诗”的改称,既结束了前者的权宜性,又确立了后者的文学史地位——为中国现代诗歌这种文体确定了后世公认的名称。自胡适的“新诗”概念出现后,当时的新文学界纷纷采用,如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6]、宗白华的《新诗略谈》^[7]、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8]等,表明“新诗”的名称符合新文学革命的实际。自此以后,各界都使用“新诗”这一概念,终至其成为指称该文体的称名。

不过,由于胡适从尝试到总结的探索过程留下名称不一的痕迹,致使新诗研究界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现在)涉及初期这个时段时,名称的使用仍表现为多样化,或称之为“白话诗”,或称之为“新诗”,或称之为“白话新诗”。从学界使用的惯例看,“白话诗”、“白话新诗”,多指初期的新诗,而使用“新诗”的概念时并没有排除初期的“白话诗”,

以此构成一定程度的名称交错。研究者用语不一致的现象说明新诗研究还没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对该问题已有所涉及,如分析中国诗歌转型时期创作内涵变化的^[9],再如从“新诗”概念诞生角度进行阐释的^[10,11],还有从不同概念的运用角度分析的^[12],并已有成果集中阐发“新诗”概念的内涵及产生的影响,但对“白话诗”与“新诗”之间的关系还未有论及。本文认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离不开胡适,原因在于:其一,他是“白话诗”的始作俑者,也是“新诗”的命名者,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差异,正代表了他思想变迁的状况;其二,作为新文学尤其新诗倡导的主脑,胡适是处于新旧文学、新旧体诗转捩点的人物,探讨他的相关观点,更接近解决问题的主脉。

一 改称的内涵

《谈新诗》一文的副标题是“八年来的一件大事”,即自1911年10月至1919年9月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结合正标题提供的信息可知,胡适在这里是指中国诗歌的革新这件事。显然,当胡适使用“新诗”这一名称的时候,他是自尝试时期算起的,即包括他的白话入诗试验阶段在内的整个过程都属于新诗的范围。

据《胡适留学日记》,他自1916年7月开始尝试白话入诗,当他满怀信心地开始试验的时候,却遭到同为留学生的朋友们“群起而攻”,诗句于是退回五七言。直到

收稿日期:2012-05-21

作者简介:李丹(1968—),女,陕西礼泉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1917年7月归国前,他的试验之作“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2]148}。后来,这一时期的诗收在《尝试集》第一编,属于初试阶段。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仍坚持白话入诗的实践,直至1919年2月汉译英诗《关不住了》完成,标志着新诗的成立^[13]。这段时间的诗收在《尝试集》第二编,可视为成立阶段。初试期与成立期分属中国诗歌革新这一事件的不同阶段,先有试验,后有成功,那么,初期的尝试自然属于成功了了的“新诗”之一部分。1920年3月,胡适将试验以来之作结集出版,名之曰《尝试集》。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胡适是将诗歌革新的前因后果看作一件事,即缘起、经过和结果都是围绕一个目标进行的。

不论《谈新诗》还是《尝试集》,都体现着胡适对现代诗歌这种文体名称的一致认识,即由“白话诗”而“新诗”,是后者替代前者,是改称,不是对前后不同阶段的分别命名。

二 第一个使用“新诗”名称的人

胡适《谈新诗》一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号》第5张上,这一期的《星期评论》是特刊,是为纪念国庆增加的号外,其前一期是1919年10月5日出版的第18号,后一期是1919年10月12日出版的第19号。据笔者调查,《谈新诗》是首先使用“新诗”名称的文章,此前相关的报章杂志上并没有出现使用“新诗”这一名称的文章。

《胡适来往书信选》收录了若干与这件事有关的信件。1919年9月22日戴季陶、沈玄庐去信向胡适约稿,请他为《星期评论》的“双十节纪念号”写文章,并要求“本月卅号前寄到上海”^{[14]20}。实际上《谈新诗》文末署的日期是“民国八年十月”,可知胡适是赶在纪念号出版前的10月初定稿并寄出的。国庆特刊的出版是有影响的,当年10月20日廖仲恺在给胡适的信里,谈及《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刊载的《谈新诗》一文^{[15]73},可见该文一经发表便产生了反响。

有一篇在相近时间发表的文章也采用了“新诗”的名称,即《新潮》2卷1号刊登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作者是俞平伯,文尾没有署写作时间,该号的出版日期是1919年10月30日。这一期的《本社事启》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号原应在八月一号出版的;只因几月来,为了五四运动,本社社员自当分负些责任;况且我们的学校,那时候天天在惊风骇浪之中,也不能安心作文办事;所以迟至今日。”这段话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俞平伯在1919年10月之前写就该文,因延迟出版之故,才与胡适的《谈新诗》在一个月份内发表;一是作为胡适的学生,俞平伯受到胡适改称的影响,及时应用于自己的文章。本文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原因有三点。其一,在新思潮方面,俞平伯1919年前后发表的文章涉猎面较广,不仅有关于诗歌的,也有关于其他问题的,如作于1919年2月5日的《打

破中国神圣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16],发表于1919年5月1日的《我的道德谈》^[17]等,说明他是从青年学生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积极响应,表示自己与先进思潮保持一致,并注重其启蒙性。其二,在诗歌创作方面,俞平伯的诗集《冬夜》于1922年出版,收集了“三年来作的新诗”^{[18]5},即从1919至1921年所作的新诗,表明他的诗歌创作是跟随初期新诗潮流开始的,也就是对老师胡适的倡导的响应,以促使初期新诗早日获得认可。其三,关于改称,俞平伯的两篇关于初期新诗的文章——《白话诗的三大条件》^[19]和《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尽管名称变了,但所谈问题与名称变化的相关性不大,后者主要针对初期新诗的外部问题而谈,所涉及的初期新诗内部问题也是对前者观点的延伸。这一年之间,他既忙于属文响应新文化运动,又置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之中,应无暇顾及使用“白话诗”还是“新诗”的名称;且在这期间的有关文字记载中,并没有他对诗歌名称改变问题的思考。可见他的文章标题所用名称的变化,是随着整个新文学革命的进程而应时发生的。这里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在《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的文后,附有一段胡适的告白:“俞君这封信寄到这里已有四五个月了。我当初本想做一篇‘白话诗的研究’,所以我留下他这封信,预备和我那篇文章同时发表。……我也还有几条意见,此时乃不及加入,只好等到我那篇‘白话诗的研究’了。”^[20]可以推测,这时《白话诗的研究》的写作计划就是半年后发表的《谈新诗》,否则,在《星期评论》主编约稿后1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不可能拟竣“一万字的文章”^[21],而且主题这样严肃,内容这样详实;也就是说,《谈新诗》是《白话诗的研究》的定稿样态。经过几个月的思考,结合初期新诗取得的成绩与产生的影响,又逢“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新文学革命取得成功,当此历史机遇,胡适果断地改称“白话诗”为“新诗”。

胡适之前的近代诗歌革新多被称为“新学诗”、“新派诗”^[22];也曾出现“新诗”的字眼,如梁启超“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捭揜新名词以自表异”^{[23]49},但由于缺少正面的论证,故不具有理论意义,其用法与“为赋新词强说愁”中的“新词”属于同一层面的含义。

问题到了这里,重要之点似乎不在于是谁提出了“新诗”的名称,而在于为什么要改称?

三 改称的原因

如果说在尝试阶段,胡适无力考虑初期新诗的名称怎样才恰当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新文学运动高潮之后,提出正式名称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尝试阶段的情况从1917年6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4号发表的胡适《白话词》4首即可看出,除了“白话诗”之外,还出现过“白话词”^{[24]1318}的名称,说明他当时的任务仍以白话写诗能否为学界接受为主。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胡适最早提出白话文言的区别,主张“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认为“白话可产生第一流文学”包括“白话的诗词”,并于1916年7月写出第一首“白话诗”——《答梅觐庄》^{[25]253,255,270}。“白话诗”、“白话词”都突出了日常口语在诗词中的应用,这样的名称也是可以的;况且尝试期的关键是这种新诗体能否成立的问题,至于名称则属于后续事宜。因此,“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言语’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26]。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白话入诗跨过成立阶段的门槛,新文学革命告以成功,胡适才认为有必要对初期新诗的确立进行总结;也只有在这时,他对名称问题才有了明确的认识。

首先,从建设新诗的角度而言,一些初期反对白话入诗的朋友渐渐地开始理解他,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朱经农的鼓励与提议:“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要想‘白话诗’发达,规律是不可不有的”^[27]。还有一些诗歌革新支持者如前述钱玄同、俞平伯等都曾著文推动这一进程,这也从另一角度为新诗的确立构成支持力量。所有这些建议与探讨,都促使胡适对诗歌革新运动进行总结。可以说,胡适从“白话诗”到“新诗”这一名称的重大改动,并非可有可无之举,却正是通过《谈新诗》一文,他回顾了诗歌革新的诸般问题,并设定了新诗的一些规则,为其推广提供可行的依据。

其次,从肯定新诗创作取得的成果角度而言,《谈新诗》是对若干否定态度的一种回应。如梅光迪讽刺胡适留学时的试验之作为“莲花落”、“俗语诗”^{[28]1203,1204},朱经农则称其为“打油诗”^{[3]289}。最初胡适用白话写诗,由于缺少可模仿的样本,只能在摸索中进行,难免写得浅白、坐实乃至陷入顺口溜的泥淖;同时,这些试验之作也可以看作朋友间的戏仿,并非正式的诗作^{[25]270-274}。不过,胡适归国后用白话写作的诗尤其是1919年前后的诗,已被认可为新诗;后来《尝试集》出版,两年之内销售过万册^{[29]5},就是有力的证明。况且,在胡适的倡导下,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康白情、傅斯年、俞平伯等人都参与初期新诗的写作,且有不俗的成绩,如《三弦》、《小河》等成为初期新诗的名作。这些成绩都是对曾经出现的反对之声的有力回击^①。

《谈新诗》也是对各种怀疑观点的答复。任鸿隽曾质疑道:“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30]413}。胡适曾多次申明,诗歌革新倡导是从白话入手,而不是以白话为目的。这也是新文学革命阵营的共同认识。周作人曾说:“文学

这事务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31]3-5}形式改革是内容改革的前提,诗意、诗境的营造才是其革新的目的。当有意境的新诗诞生的时刻到来之后,胡适自然要对白话入诗试验以来遭遇的种种质疑进行应答;这时,在名称问题上,如果沿用“白话诗”,似乎没有突破“文言白话之争”的藩篱,也难以表达新诗体所承载的新内容,而“新诗”的名称则能体现其新颖之所在。

最后,从中国诗歌发展史角度而言,胡适称之为“新诗”而非“白话诗”,用以强调与古典白话诗的区别。起初,胡适认为采用口语而作的诗就是“白话诗”,一方面,他自己试验用白话作诗,《尝试集》就是为了证明白话可以作诗的成果。另一方面,他从中国诗歌史中寻求先例,《白话文学史》就是其考察的结果:中国诗歌自古就存在“白话诗”,诸如《诗经》的十五国风、汉乐府民歌、晋陶渊明的诗、唐新乐府诗等等,在在证实白话诗歌的存在历史,也为胡适在20世纪倡导白话入诗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与此同时也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白话诗”自古就存在,而胡适称自己倡导的用口语写作的诗为“白话诗”,那么两者有没有区分呢?古典白话诗尽管采用白话,但都遵守一定的诗歌规则。如《白话文学史》里列举的李白《静夜思》和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尽管这两首诗都没有使用典故,也没有晦涩、冷僻的词语,而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可以说它们是“白话诗”;然而,它们在字数、押韵、对偶或平仄等方面又遵循规则,文学史称之为绝句,前者为古绝,后者为律绝。即便是歌行体也符合一定的诗歌规则要求,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都是五言诗,偶句押韵,还出现对仗。而胡适倡导的初期新诗则不仅没有格律要求,反而要打破的正是这些旧格律规则。因此,尽管都采用白话,且现代白话从古代白话演变而来,但毕竟发生了重要的变更,具体到诗歌语句,胡适倡导的初期新诗挣脱了古典诗词格律的捆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体大解放”了的语体诗。这一诗体之所以能够成立,一定程度与现代汉语的句法习惯有关,此外还接受了英语自由诗汉译的影响,如胡适、郭沫若等先驱“正是由于在国外的阅读以及翻译经历,他们得以置身于中国传统诗学之外,能更好地对比中国诗学与外国诗学的长短优劣,以外国诗歌的新风吹动中国传统诗歌这一池静水,从而别开新路,另辟诗风”^[32]。初期新诗的语言样态明显不同于古代,假如笼统地称所有语体诗为“白话诗”,那么就抹杀了古典白话诗与初期新诗的差别。故“新诗”这一名称较“白话诗”更贴近现实,也用以区别于古典白话诗。

如果说胡适写《谈新诗》之前的初期,新诗还属于尝试

与成立的阶段,那么《谈新诗》发表之后,就进入了新诗的大力推广阶段。

四 改称的结果

从客观角度看,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一定程度受外在条件的制约,胡适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改称之所以很快被接受,是因为这一改称符合当时诗歌革新历程的实际情况。从主观角度看,胡适拥有开阔的视野,明确的目标。他的指导思想是,“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33]¹¹¹³。为此,在实际操作中,胡适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对策,以适应变动中的状况,也力图以事实取胜。

在白话入诗的试验过程中,为改变其停留于俗话诗的状态,胡适做过各种尝试:如五言白话诗的运用,白话入词的试验,但当他发觉这是对旧体诗词的回归时,随即主动取消这种试验;又如当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时,转而通过译诗这一再创作作为新诗的成立助阵。在新诗成立之后,胡适既要考虑其音节的问题,还要表达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即强调“诗调”、“诗意”^[34]⁴²⁹;在音韵方面,如对《尝试集》诗句“双声叠韵”的分析,这种“戏台里喝彩”^[35]¹⁸⁸⁻¹⁹³,实际上是一再强调自己苦心经营的诗作着力处之所在;在内容方面,译诗《老洛伯》、《关不住了》表达自由恋爱的观念,《“威权”》、《一颗遭劫的星》是对军阀专制统治的讽刺,还有《双十节鬼歌》、《人力车夫》、《礼》等包含着民主、民生、新式礼节等思想观念。这样,初期新诗作为新文学之一种,既有新的语言形式,又有新的精神内容,那么,其名

称自然可以是新的。所谓“新诗”,就是新的内容通过新的形式得以传输。

除从写作角度努力而外,胡适还将摸索出来的经验从理论层面进行概括。其一是“诗体大解放”,这是对来自旧体诗阵营里的诗人的劝告。初期新诗就是要跳出五言七言、古体律绝、平仄对偶等格律规则的限制,在自由的状态下写作。“诗体大解放”是胡适坚守的基本原则,是新旧诗体转换的支点。其二是“自然的音节”,这是对摆脱旧体诗束缚之后无所适从的写作状态的引导。“节”是诗句里的顿挫,“音”是诗的声调,即平仄、用韵,其关键是要自然,“音节”就是按照口语的节奏,诗句自然和谐;且在整首诗里,要讲究层次、条理、排比、章法、句法。其三是“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这是对初期新诗意象的强调。胡适认为诗需在视觉、听觉乃至全身的感觉里产生“影像”,生动的意象是初期新诗的生命。这些来自实践的创作理论,使初期新诗与古典诗词在诗意、诗境方面有同等的要求,却在体式上相区别,故称之为“新诗”更适宜。

一言以蔽之,胡适尝试实践过程的胜利结束,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事实,故而水到渠成地进行理论概括,并确立了“新诗”这一称名,该举措是切合中国新文学推进状况的,再借助五四运动的强劲势头,便将“新诗”及其名称成功地推广开去。事实表明,在发表之后的10多年里,《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36]²。可见,胡适改称后的“新诗”影响之大,持续之久。

注释:

①关于胡适对论敌的回应,可从《尝试集·四版自序》答复胡先骕认为《尝试集》“必死必朽”的意见看出。参见:《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参考文献:

- [1]胡适.我为什么要作白话诗——《尝试集》自序[J].新青年,1919,6(5).
- [2]胡适.尝试集·自序(1919年8月1日)[M]//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3]朱经农致胡适(1916年8月2日)[M]//胡适留学日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 [4]任鸿隽致胡适[M]//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钱玄同.尝试集·序(1918年1月10日)[M]//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6]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J].新潮,1919,2(1).
- [7]宗白华.新诗略谈[J].少年中国,1920,1(8).
- [8]康白情.新诗底我见[J].少年中国,1920,1(9).
- [9]王光明.从“白话诗”到“新诗”[J].辽宁大学学报,2004,(1).
- [10]伍明春.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6,(4).
- [11]伍明春.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4).
- [12]唐莉.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从三次命名看中国新诗的生成[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1).
- [13]李丹.胡适:汉英诗互译、英语诗与白话诗的写作[J].文学评论,2006,(4).
- [14]戴传贤、沈定一致胡适[M]//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廖仲恺致胡适[M]//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6]俞平伯.打破中国神圣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J].新潮,1919,1(3).
- [17]俞平伯.我的道德谈[J].新潮,1919,1(5).
- [18]朱自清.冬夜·序(1922年1月23日)[M]//俞平伯全集:第1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 [19]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1918年10月16日)[J].新青年,1919,6(3).
- [20]胡适.通信[J].新青年,1919,6(3).
- [21]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M]//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22]龚喜平.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J].西北师大学报,1988,(4).
- [2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24]缪金源致胡适(1919年9月24日)[M]//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25]胡适留学日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 [26]高蔚,徐径.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 [27]通信·新文学问题之讨论[J].新青年,1918,5(2).
- [28]梅光迪复胡适(1916年7月24日)[M]//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29]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1922年3月10日)[M]//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30]任鸿隽致胡适(1916年7月24日)[M]//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31]周作人.思想革命[M]//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 [32]曾祥敏.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 [33]胡适致钱玄同(1918年夏)[M]//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34]胡适复任鸿隽(1918年7月26日)[M]//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35]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1920年9月15日)//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36]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G]//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On Hu Shi's Renaming of Baihuashi (Vernacular Poetry) to Xinshi (New Poetry)

LI Dan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Renaming of Baihuashi(vernacular poetry) to Xinshi (New Poetry) is an significant iss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It reflects the change of Hu Shi's understanding of naming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in different times. The renaming involves the respective naming time, the respective connot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names as well as the cause and the result of renaming. All those questions can be answered by the research on Hu Shi's viewpoints.

Key words: Hu Shi; Baihuashi (vernacular poetry) ; Xinshi (New Poetry); rename; *On New Poetry*

[责任编辑:唐 普]